

## 全球化与中东社会思潮研究

**编者按** 下列3篇论文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铁铮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化与中东社会思潮研究”的部分阶段性成果。这组论文或是着眼宏观，或是以具体国家为个案，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剖析了不同时期中东国家社会思潮起落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及其对中东国家和中东社会的影响。作者试图通过对中东社会思潮的探索，为人们更好地解读当代中东的相关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并能促进更深入的研究。

# 战后中东社会思潮 的演变及特点

王铁铮

**内容提要** 社会思潮的形成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物质和历史条件，同时与社会发展呈互动关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思潮又是反映社会动向的“晴雨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社会思潮依次经历了大致3个不同时期的潮起潮落变化，折射出中东国家在社会变革、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承受着世俗与宗教、进步与落后、保守与开放、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撞击的阵痛，逐渐由“理想化”走向“理性化”的波浪式发展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中东国家 社会思潮 特点

**作者简介** 王铁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生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物质和历史条件。同时，由于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互动联系，一种社会思潮的盛行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国情和民意的走向。因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社会思潮的探索将为人们从宏观视角诠释该地区各种充满变数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等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

### 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起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世界范围民族民主运动的勃兴，中东各殖民地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和社会变革后，纷纷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迅速走上独立与发展的道路，最终促使现代中东

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sup>1</sup>。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东各国谋求独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当时广为传播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曾对不同的中东国家和民族群体构成重大影响,并在一定意义上主宰着它们的发展方向。这些思潮就其内涵和流行范围来说,大致可划分为 5 种类型,即: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以复兴社会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君主国以和平方式争取政治、经济独立的温和民族主义;伊朗的“白色革命”和盲目的西化狂潮;向“故土”回归的犹太复国主义。

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东地区出现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是各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反映了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强权蹂躏的中东各国、各民族渴望民族解放、民族尊严和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各国的差异,蕴含在各种社会思潮中的价值取向、政治诉求及其锁定的终极目标又存在明显区别。概括起来讲,这一时期的中东社会思潮有如下特点:(1) 这些思潮不属于纯理论的思辨哲学,“纯理论的思辨哲学在中东只有有限的普及程度”<sup>④</sup>。中东社会思潮所关注的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各种思潮的倡导者基本上都是统治者、执政党或当权者。因此,某种社会思潮通常都会付诸于实践,迅速转化为一种政治行动或政治运动,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走向的“主流意识”,乃至基本国策。(2) 战后至 70 年代中东的各种社会思潮多为本土和外来意识形态的混合体,不同程度地融合了非本土文化和文明的某些养分,并加以适当改造,赋予其本土特征的价值取向,从而激活和满足不同国家及政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被多数共和制阿拉伯国家推崇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便是伊斯兰传统、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非本土的科学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结合物。(3) 中东地区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和渊源久远的传统,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社会思潮所聚合的宗教成份,或是以宗教为基点,或是坚持世俗化,无不围绕宗教而显露分野。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宗教影响根深蒂固,且是信徒们摄取精神食粮的源泉。特别是伊斯兰教,它具有的强烈涉世性使其成为穆斯林社会思潮无法规避的要素。但宗教对中东社会思潮的催生作用和影响,绝非伊斯兰教所独有。犹太教同样如此。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兴起便是从希伯来《圣经》中有关“迦南地是上帝应许的土地、犹太人是特选子民、以色列终将复国”<sup>④</sup>等理念中寻找到了为犹太人“合法”向故土巴勒斯坦回归,建立“犹太家园”的历史依据。(4) 从本质上看,战后中东的社会思潮大体上可划归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范畴。区别在于,因各国的历史遭遇和西方列强曾在中东采取的殖民方式不同,这样就使中东社会思潮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存在激进与温和之分。

一般来说,凡是遭受奴役和压迫最重的地区,其社会思潮所显露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就愈加强烈,其社会政治变革要求也比较激进。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共和制阿拉伯国家推崇的复兴社会主义和纳赛尔主义都具有上述特征。

中东君主制阿拉伯国家主要集中在海湾,均为盛产石油的王国。该地区早在 19 世纪已成为英国的“内湖”。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海湾的地位被美国所取代。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基于控制石油资源和全球战略的通盘考虑,竭力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并以各种方式充当王权的“保护人”。另一方面,海湾国家封建保守势力相对强大,政治发展滞后,但人烟稀少、国势孱弱的状况又不能不使它们仰赖英美两国的扶持。这种彼此利用、互有所求的关系导致海湾君主国始终无法割断同殖民者的各种联系。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湾各君主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像共和制国家那样来势迅猛,其政治诉求大都比较温和,主要体现在要求扩大维护民族资源的主权或争取提高控制石油权益的份额上。这些小王国的独立基本上也都是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的。

向故土回归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思潮。它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过程。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犹太教是锻铸犹太民族个性的精神内核。犹太人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散

<sup>1</sup> 参见拙文:《论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载《西亚非洲》,1991 年第 6 期,第 41~48 页。

<sup>④</sup> [美国]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sup>④</sup> 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生活，以及中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多次反犹、排犹和屠犹的民族悲剧后，产生“回乡”和“复国”的信念，是一种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反应。而且，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民族权利的角度来看，都不能不承认其合理性。同时也不能断然否认其内在的民族主义因子。但是，当犹太复国主义真正转变为一种政治行动时，由于它一直得到谋求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某个大国的偏袒与支持，便助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恃无恐地以牺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他们的复国之梦，从而使犹太复国主义沾染上“种族扩张”的污点。

伊朗的国情有所不同，自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后，在波斯人争取民族自立自强和国家复兴的过程中，其领导权在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述情况未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伊朗民族民主力量的成长一直受到王权的抑制。这也是战后伊朗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之所以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之一。石油国有化运动夭折后，由伊朗国王巴列维发动的“白色革命”是统治集团为迎合伊朗国内外出现的变革思潮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其出发点在于避免由民众发动的红色革命抵御由宗教领袖领导的黑色革命，把伊朗建成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推进国家和民族发展来看，它也具有民族主义的内涵。

自近代起，中东对外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欺凌和奴役，对内则承受依附于列强的顽固封建势力的压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东人民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抗争中，在中东各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孕育而生。这些社会思潮承载着不同国家和民族求新、图变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并对战后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唤醒了中东民众的民族觉悟和民族精神，强化了他们争取国家独立和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斗志，维护了其自身的民族权利和民族尊严。与此同时，战后中东的各种社会思潮大都被不同国家付诸于实践，成为各国谋求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选择。尽管各国的实践存在差异，但整体说来，至少在两方面应予肯定。其一，中东社会思潮在转化为政治行动或治国策略后，由于它们普遍具有的反帝、反殖、反封建的属性，因而不同程度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东的存在及影响，强化和巩固了民族独立国家的地位，并由此得以自主地掌握本国的命运。其二，中东社会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新兴的中东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为中东国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双重性，新生事物尤为如此。如前所述，中东社会思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在抗争中培育而成的新思潮，同时它们又是在各种主客观条件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转而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尝试的指导思想。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中东各国在战后各种社会思潮的主导下进行的旨在强国的多种实践，未能充分显示出它的持久优越性及对民众的强大吸引力。相反却诱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冲突。其中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发展失衡，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集中反映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中东各国在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都未能从本质上促成相应的政治变革，并形成一套适宜本国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民主政治体系。多数中东国家仍然维持着原有的传统政治结构，或是迫于形势，仅对原有的传统政治结构稍加改良。即便那些曾对民主政治满怀渴望和向往的开明政治家，一旦被推上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集权和专制的铁腕，选择了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中东各国的当权者既希望通过变革和现代化发展来实现强国之梦，又无限眷恋和崇拜凌驾于万民之上的个人权威。个人或一党的专断便成为各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中种种失误与弊端的渊藪。

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社会思潮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多数是在各国广大民众远未自觉的情况下仓促而起的实践。除少数政治精英和力主变革的先觉者外，中东国家的民众大都习惯于旧的思维模式，缺乏应有的承受社会变革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无情冲突的心理准备和持久耐性，更不具有在这种冲突中寻求生存的本能。他们分辨不清哪些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哪些是人为造成的过失。当他们在社会变革中获益时，常常会采

取迎合态度; 当社会变革对他们久已熟识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旧的生产方式形成强烈冲击而使其若有所失时, 他们则感到困惑和迷惘, 甚至会对社会变革持有敌对情绪, 以致于各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普遍缺乏一种适宜的氛围和必要的理解与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 中东各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社会思潮推动下实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还因刚性法规、民主政治、约束机制、调控政策和应急手段等方面的严重缺失, 加之个人专断的盛行, 由此不断衍生诸多令民众深恶痛绝的痼疾: 政府和官宦腐败成风, 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 当权者疯狂聚敛钱财, 贫富两极分化迅速扩大, 失业和贫困人口急剧增长等。这些痼疾的负面影响最终都演变为诱发社会剧烈动荡的因素。20 世纪 70 年代末,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下, 曾风靡一时的战后中东各种社会思潮的“让位”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该地区的兴起便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 伊斯兰潮和中东社会的震荡与裂变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一种社会思潮逐渐发展为社会运动的政治现象。

毫无疑问, 伊朗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东伊斯兰复兴思潮的进发地, 也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之一。伊朗之所以能够在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取决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广泛而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召唤力, 以及什叶派宗教势力同伊朗世俗王权之间的长期斗争。在伊朗现代史上, 世俗王权同宗教神权之间的斗争、妥协和合作交替出现, 但斗争远远大于合作。原因在于, 世俗王权不断对宗教神权进行削弱和打击。巴列维王朝的创建者礼萨·汗早期仿效凯末尔模式在伊朗实施的世俗化改革,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对什叶派力量构成了无情挤压, 王朝政教关系趋于恶化。因此, “在礼萨国王统治的整个时期, 什叶派宗教界人士虽然沉默不语, 但一直是他的敌人”<sup>1</sup>。处于蛰伏状态的什叶派始终在积蓄力量寻找向世俗王权发难的时机。

礼萨·汗的继承者巴列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发动的“白色革命”也是一场世俗化变革运动。其初衷是尽快摆脱伊朗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束缚, 加速推进伊朗现代化, 早日实现王权统治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美梦。但随着“白色革命”的深入进展和伊朗国力的骤然增强, 巴列维急剧膨胀的权欲、专横和独裁使伊朗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偏离了既定目标, 走上了一条疯狂和畸型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将巴列维推向了伊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对立面, 从而为什叶派宗教势力的崛起, 并在全国发动和领导反对王权的伊斯兰革命创造了条件, 貌似强大的巴列维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

伊朗现代化运动的失败和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似乎印证了有关“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以及“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标志是常常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sup>④</sup>的结论。伊斯兰革命旋即在中东各国产生的强烈共鸣和回应便构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潮。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兴起及其随后形成的复兴运动主要关涉两大问题: 一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国家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 二是对处于困顿和趋于衰弱中的传统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的重新肯定, 同时也是对迅速渗透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抗拒。战后中东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在不同社会思潮和发展模式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变革与现代化尝试大都失败, 穆斯林崇尚的伊斯兰精神和价值观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严重冲击与侵蚀, 由此唤起中东各国广大穆斯林对早期被理想化的伊斯兰“盛世”的怀念和向宗教的回归。但对于当代的伊斯兰教来说, 呼唤向宗教的回归不能单纯视其为复古, 它的真正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强化伊斯兰教在国家和社会中的

<sup>1</sup> [苏联] E. H. 多罗申科:《伊朗的穆斯林什叶派传统与当代现实》, 转引自《西亚非洲》, 1982 年第 1 期, 第 26 页。

<sup>④</sup>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第 38 页、35 页。

地位。同时托古改制、自我更新，通过复古的主张和要求，达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便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实的需要。<sup>1</sup>

此外，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和阿拉伯人在历次战争中败北是20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固然，阿以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巴勒斯坦的归属权，但隐匿在其后面的宗教对立和相互鄙视则加剧了阿以冲突的惨烈性与悲剧性。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尽管它们有共同的根和部分相似性，但犹太教的语言和文化几乎完全不同于伊斯兰教，犹太会堂不同于清真寺，犹太人不同于穆斯林。”<sup>④</sup>“离开宗教文化背景是难以理解阿拉伯反对以色列人的狂热感情的。”<sup>④</sup>

阿拉伯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民族群体，其人口数十倍于犹太人，但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人同犹太人的战争都屡屡失利。阿拉伯人在人员、财产和土地等方面蒙受巨大损失，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被褫夺，阿拉伯人饱尝战败者的屈辱。战争暴露了阿拉伯统治者或当权者的松弛懈怠、尔虞我诈和腐败无能，也凸显了阿拉伯人疏离、凝聚力匮乏等种种弊病。事实上，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一直是阿拉伯人的政治追求。从复兴党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到纳赛尔倡导的“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均昭示出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在阿拉伯人心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实践中，不管是双边的（埃叙联合、约伊联合）、还是多边的（埃、叙和伊拉克的联合），以及全体阿拉伯人的联合与统一都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民族由不同阿拉伯国家组合而成所致，它不像聚居于一国的民族那样，国家利益即民族利益。阿拉伯世界则存在诸如阿拉伯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也门人等等之分，而鼓吹阿拉伯统一者往往伴有充当阿拉伯领导者的私欲。关键时刻，民族利益便被弃之脑后，让位于国家利益，从而造成阿拉伯人的四分五裂。因此，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试图用宗教固有的内聚力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强化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抵御共同敌人。

总体上讲，20世纪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潮是一种宗教与政治混合物，同时也是中东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其表现形式主要有3种：（1）宗教与政治，或政治与宗教，互为融汇，并由官方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生活伊斯兰化的新的泛伊斯兰主义；（2）在中东各国民间广泛存在，且自发地要求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强化伊斯兰信仰，恢复伊斯兰固有文化传统的“群众性”运动；（3）由少数人鼓动但能量极大的纯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亦即西方人通常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称激进的宗教思潮。<sup>④</sup>另一方面，这些表现形式各异的伊斯兰潮还有某些共同点或相似之处。第一，它具有超民族、跨地域、不受国界限制的特征。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骤然而起的伊斯兰潮以中东为辐射点，迅即波及亚非两大洲广阔地带，乃至全球其他地区。其涉及地域之广，民族之多，人数之众，均为世界罕见。它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也是空前的。第二，伊斯兰潮和复兴运动呈现多中心、互不统属和形式多样的色彩。思潮兴起时间相对集中，彼此互动，但无统一性。因为它不存在得到所有穆斯林认同的领袖或权威人物，更无任何统一的行动纲领或计划。各地的伊斯兰潮大都以我为中心，追求的目标也很不一致，甚至相互指责和攻讦。第三，普遍带有反对西方和外来“异质”文化，谋求自身“净化”和发展的性质。同时，它们还把斗争矛头指向本国当政者，抨击他们与西方同流合污，谴责他们政治腐败，宗教和道德松弛与堕落等。

20世纪70年代末的伊斯兰潮延续至90年代中期。它对中东国家和中东社会的影响非同寻常，并在某种程度上变更了中东的政治地图和各派力量的对比。具体表现是：（1）中东地区诞生了两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它们成为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重要堡垒；（2）许多中东国家的宗教政治反对派频繁发起夺取国家政权的攻势，致使这些国家政局不稳或权力更迭频繁。同时，反对派还制造

<sup>1</sup> 参见金宜久：《论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载《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第14页。

<sup>④</sup> John F. A. Sawyer, "Islam and Judaism", in Denis Maceoin, Ahmed AL-Shahi (eds),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 Croom Helm, 1983, p. 27.

<sup>④</sup> Michael Courtis (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Westview Press, 1981, p. 75.

<sup>④</sup> 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

各种爆炸、绑架、谋杀政要等事件, 酿成严重社会“骚乱”; (3) 中东国家程度不一地出现了社会生活伊斯兰化的趋势, 宗教礼仪、法规、戒律和伊斯兰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得到强化。

综上, 可以看出,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是由内外多种因素引起的, 这种复杂性注定了其表现形式及追求目标的多元性。因此, 不能简单而笼统地对它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当代中东国家试图通过复兴宗教的途径来摆脱当今穆斯林世界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危机, 从而振兴伊斯兰教, 重铸伊斯兰教昔日的辉煌, 在这一点上则是相通的。

## 后冷战时代中东社会思潮的走向

20 世纪 90 年代初, 随着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就中东地区来说, 后冷战时代初期, 对中东社会和中东政治构成最大影响的莫过于 1991 年的海湾战争。由于美国打赢了战争, 以及战后美军在海湾的大量存在, 致使美国在中东的影响飙升, 战后中东格局更有利于美国。另一方面, 虽然美国打赢了战争, 但中东和海湾地区原有的种种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而且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 中东国家经历了新一轮分化与组合, 中东局势更趋复杂化。这种态势导致战后中东国家的反美、仇美情绪持续升温, 且强烈刺激一度趋于“平缓”的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反弹。20 世纪 90 年代初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在中东出现第二个高潮。它自东向西、西北扩展, 并在那些贫穷和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的国家形成气候。虽然这股伊斯兰潮所释放的“能量”不能同 70 年代末期相比, 其波及面和持续时间也有限, 但它对各国政府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却很大。

关于后冷战时代中东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的走向问题, 国内研究者曾提出诸如“运动衰败论”、“中心转移论”、“东西呼应论”和“十字路口论”等观点<sup>1</sup>。尽管各种观点之间存在歧见, 但多数人比较认同后冷战时代中东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呈“退潮”之势的看法。主要依据是: (1) 中东局势总体趋向政治和解, 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它在启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同时, 加大对极端宗教势力的遏制; (2) 中东各国迫于压力, 加强与外部世界联手围堵打击极端宗教势力和非法宗教组织, 制定一系列防范机制; (3)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趋势日渐强劲, 对中东各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构成巨大挑战, 中东各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更加突出, 它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民众对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兴起之初的那种狂热与激情。另一方面, 解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退潮”, 还必须从它自身寻找原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植根于贫穷、耻辱、失望和怨恨之中, 产生于包括从外部引进的及当地伪造的各种政治、经济的‘灵丹妙药’失败之后。”<sup>④</sup> 反观伊斯兰复兴运动, 它的盛行并未将广大穆斯林带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平等和谐和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相反, 因受极端宗教思潮的困扰, 许多中东国家长期处于政局动荡、战乱不止、经济恶化和民穷、国弱的窘境。这种状况势必引发中东各国民众的深思, 并着力探寻思维定势和政治诉求的新突破。

实际上,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在全球化大潮和中东各国力主强化政治、经济变革呼声的推动下, 中东社会思潮朝着温和、理性和务实方向的转化已在不同国家悄然而起, 并已初露端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仍坚持复兴社会主义的国家, 如叙利亚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 在政治层面适度放松了对国民的控制, 实施有限民主化和执政理性化的变革; 在经济层面融入全球化经济理论, 选择政治稳定优先的发展模式; 在国际关系层面以国家利益为首要原则, 理想主义服从现实主义。(2) 海湾君主国迎合时代和民心所向, 加大政治改革步伐, 并在伊斯兰框架内开始引入政治民主化的一些程序和机制。同时为“软化”国内不断升温的反美情绪, 亲美政策有所收敛或节制。(3) 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 其强硬和浓重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内外政策不同程度地“蜕变”。

<sup>1</sup> 参见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亚非研究动态》, 1995 年第 1 期。

<sup>④</sup> Bernard Lewis, “Rethinking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2, p. 115.

然而，后冷战时代中东社会思潮也有暗流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21 世纪以来中东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的泛滥，而九一一事件则将这种暗流推上了“颠峰”。恐怖主义的源头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它在中东穆斯林群体和非穆斯林群体中都有表现。需要澄清的是，在涉及恐怖主义问题时，往往有人会将它们同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或者视为等同关系。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鼓吹恐怖主义和煽动恐怖活动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一股逆流，属极少数人所为，它决不能改变或替代伊斯兰教的主流发展方向。美国著名学者埃斯波西托亦曾指出：“专注于作为一种全球性威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助长了一种把暴力等同于伊斯兰教的倾向。这种倾向未能把个别人非法地利用宗教与世界穆斯林大多数的信仰和实践区别开来，而后者如同其他宗教一样，希望在和平中生活。”<sup>1</sup>

中东恐怖主义的产生和恐怖活动的大量存在是由多种因素所致。就阿拉伯世界来说，这些因素包括：伊斯兰极端分子对“圣战”含义的歪曲；阿以流血冲突持续升级和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及建国之梦的绝望；美国在中东的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战争，以及以色列仰仗美国的袒护对巴勒斯坦人更趋僵硬的政策；全球化致使阿拉伯国家的进一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的蔓延。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在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宗教分子中诱发了复仇的回应。他们转而宣扬对阿拉伯人的仇恨，鼓动以“牙”还“牙”，“为上帝而牺牲”，甚至期待以色列用核武器消灭所有的阿拉伯敌人，建立全新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的以色列王国<sup>④</sup>。其结果，阿犹之间的暴力和恐怖活动长期陷入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怪圈，且无情地蚕食着彼此仅存的对和平的企盼。但犹太极端势力的暴力和恐怖行为不同于伊斯兰教，呈现国家恐怖主义的态势。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内厌恶战争和渴望和平的力量也在上升，并出现“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萌芽。这一思潮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应向后犹太复国主义过渡，即从排外主义向多元主义转换；从犹太人占主导地位向与其他阿拉伯邻国处于敌对状态向与该地区融为一体转换。<sup>④</sup>

此外，后冷战时代，由于两极格局崩溃，原来长期被遮盖的民族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因此，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新型民族主义也是后冷战时代中东社会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中东的民族问题涉及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柏柏尔人等。其中以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最突出。伊朗也存在库尔德问题，但不像土、伊那样严峻。三国的库尔德问题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库尔德问题的实质是：库尔德人要求实现其民族解放，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要求在库尔德人聚居区实行民族自治，分享更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要求享有与所在国所有公民同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等。长期以来，库尔德人为实现政治目标，分别同各所在国政府进行不懈的抗争，致使库尔德问题犹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困扰着所在国政府。同时它对中东局势也构成一系列负面效应。后冷战时代，库尔德问题又有新发展。在库尔德人争取合法民族权利的过程中，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有所上升，暴力和恐怖事件频频发生，并在国际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库尔德人极其活跃的反政府活动分别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掀起轩然大波。但均遭到土、伊政府的严厉镇压。库尔德问题障碍重重、前景难卜。因为在西亚各国疆界已基本定型的情况下，承认库尔德独立，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现行中东地区的政治地图和政治结构，它将使当事国舍弃大片国土，当事国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对这种有损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分离主义做出丝毫让步。同时，库尔德问题还涉及其他诸多难题。基于这些原因，注定了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艰难性和长期性。库尔德人的未来仍取决于当事各方的忍耐、宽容和理性。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sup>1</sup> [美国] J. L. 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3 页。

<sup>④</sup> 参见王逸舟：《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sup>④</sup> 参见王京烈主编：前引书，第 241 页。

## Seeking External Investment Mechanism to Explore West Asian and African Market

*Cui Ying & Zhang Yunrui*

pp. 26– 30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external investment volume of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has seen a larger increase, it accounts for a small part in Guangdong's total foreign trade volume, and cannot provide large investment that the province needs.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West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the enterprises of Guangdong actively put in practice the "Going Abroad Strate-

gy" and expand the investment to the above-mentioned regions,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f the new situations of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and of upgrad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us, but also meets the needs of Guangdong enterprises to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mpete to larger extent, in broader fields, and on higher level.

##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Post- WW ㊦ Middle East: Evolutions and Characters

*Wang Tiezheng*

pp. 41– 47

Interacting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depends on certain social mater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a sens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is a barometer indicating social trends. Since WW ㊦,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experienced in turn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during which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continuously endured the travails brought about by

shocks between secularity and religion, between progress and backwardnes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openness, and between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 and modern civilizations in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reforms, transformations and modernizations. The basic character of wave- upon- wave development from idealization to rationalization can be clearly discerned.

## Khatam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Ir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Jiang Zhen*

pp. 54– 60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representative of civil society and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after Khatami came into power embody clearly the trend of social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Iran. The proposal of the civil society centered o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ystem indicates modern Iranians' dealing with domestic issue of governance ratio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Islamic spirits and looking closely at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is a new attempt for Iran to maintai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expand space of survival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Due to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Khatamism is still in a shaping up stage. Therefore,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slamic to Republic, and the gradual keynote of the reform will be maintained.